书里书外

温暖之光，源自温爱之心

——张逸云小说创作人性的书写

文之竹

“一直以为，我的内心足够强大，每当来到绿草萋萋的长江岸边，看着滚滚东去的江水，心岸那道堤坝便悄然无声坍塌了，双手情不自禁抄入水中，将清澈的江流捧到眼前，审视这条母亲河的来路与去向……”

阅读张逸云采风笔记，对这位深耕基层作家的小说人性书写，有了新的一层了解。

张逸云是岳阳市云溪人，一直生活在长江岸边。他认为，一个社会精神价值站立起来，需要持续不断的人性张力，就像万里长江奔腾不息，才能成其浩荡之势和沿岸悠久的历史文明。

谈到文学价值问题时，他说，文学存在的普遍意义，很大程度被视作提供人性辨识基础，作家通过洞察特定时代人物生活状态，或者，截取生活某个断面，把触角渗透到人的灵魂深处，探寻人性世界的隐秘和奥妙，构建光芒闪烁的精神坐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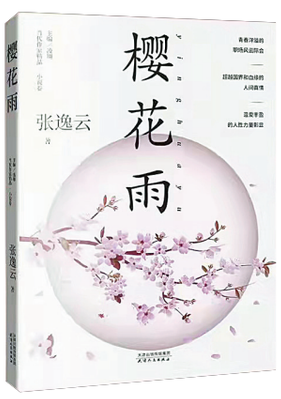
张逸云一直以这种哲学辩识方式塑造人物形象，推进故事，创造具有强烈冲击力的艺术氛围和审美情趣。2011年前后，文学期刊《芳草》《阳光》《创作与评论》《青海湖》等，以组合方式，推出他的中短篇小说系列《暗光》《凤凰山的眼泪》《隐形的翅膀》《桃花，在晨雨中飘落》《西正街情事》《油王》《王瘸子的罗曼蒂克》《蝴蝶风筝》《麻石街那些事儿》。这些作品驻足小镇山村、街头巷尾，透过社会底层人物多姿多彩的情感世界，揭示他们个性特质，构造气韵生动、色彩斑斓的生活图景。

从2014年开始，张逸云的目光聚焦岳阳地域文化，以火热的情怀和全新的艺术形式，创作长篇小说《柳毅传奇》（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小说以柳毅成长为线索，将柳毅塑造成人性与龙性结合的共主，在人性搏击龙性、自我完善过程中，追寻道德情操完美与崇高，表现地域文化的特色和魅力，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给予较高评价。

张逸云真诚而感性，目光热力四射，洞察身边那些人起起落落，用温润的目光检视人生每一个节点，注入温暖和阳光。长篇小说《山青月明》是他创作的一部重量级作品，塑造了土匪头子吴万吉这一艺术形象。吴万吉性格复杂，人生跌宕起伏，通过其从大恶到大善的人生轨迹转换，突出仁爱和善行善性。作品在中国原创文学大奖赛冲出重围，脱颖而出，荣获二等奖。

张逸云的艺术视角独特而具有穿透力，他常说，世间的生活纷繁复杂，激荡多变，尤其命运变迁或突发灾难，总是牵引着情绪变化，有种不吐不快之感。他的创作历程，就是一部情感演绎史，触摸人性脉络，给人以温暖情怀和向上力量。他在长篇小说《樱花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序”中写道：创作这部小说，让我明白一个道理：逝去的那些人和事，并未真正的离开或者消亡，而是在另外一个时空开始新的旅程。比如说蜡烛，总有化为灰烬的那一刻，却能照亮一片空域，让人感知光明和温暖。樱花的生命虽然短暂，却像火一样热烈燃烧。一夜风雨，化作春泥，成就一方沃土。

张逸云基于人性伦理本源、人性裂变与悲悯情怀，从生命的真切体验中，让置于樱花世界的灵肉无比干净，精神空域洁净而开阔。《樱花雨》以柔美细腻的笔触，描写两代人纯洁的爱情，揭示人类社会演进过程最本真的情怀，透射出温馨浪漫艺术情调。小说立足道德高地，描写两代人动人心魂的情感故事，从“情”“仁”“爱”“善”多维度，表现人性纯美，歌颂美好爱情和家国情怀；用主流价值构建道德规范，铸造“时代楷模”和“最美人物”，展示樱花精神的神圣与美好。



“右岸经济”的创新表达与实践价值

——《右岸区位与右岸经济》读后

刘永涛

受地理环境、历史人文、发展空间等多重因素影响，江河右岸往往成为人类聚居的重要场所，易于成长为区域经济发展主阵地、主引擎。其中蕴含的经济运行规律，值得探究，亦能指导实践推动发展。

与过往的区位经济理论著作不同，吴金明、文树勋、沈裕谋撰写的《右岸区位与右岸经济》，在创新论述右岸区位理论与右岸经济一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右岸经济”概念和“湘江右岸长株经济区”建设的思路和政策建议。该著作贯通古今、融会中外、呼应时代，读来启迪良多。

“右岸”是这部理论著作的论述起点。何为“右岸”，该著作做了清晰界定：北向河流的东边，东向河流的南边，南向河流的西边，西向河流的北边。从自然地理学视角和城市发展规律看，在农业文明时代，江河右岸地形相对平坦、土壤肥沃，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在工业文明时代，江河右岸因地形平坦，有利于运输和大型设施的投建，容易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作者进而通过实证解剖，拓展出“右岸区位”和“右岸经济”的内涵和外延。

事实上，基于人类生活、生产等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而形成的“空间法则”，从来不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论述。从现有区位理论来看，杜能、韦伯、胡佛、廖什等学者对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空间布局等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但大多聚焦于对“后天区位”的理论阐释。即基于地域上已有或假定的“某个点”为原点，将空间由内向外、由近及远依次展开，强调合乎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原理。

比较而言，《右岸区位与右岸经济》中的“右岸区位”论述，其创新在于探讨解决“初始区位”即“区位基点”或“区位原点”问题，通过缜密剖析，形成创新性论断，即早期的人类文明源于河流的右岸，受地球自转偏向力、水流冲击力和科里奥利力的影响，在河流右岸形成的早期堆积土台是所有区位的“原点”，区位随着堆积土台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向四周圈层扩张。

在此基础上，“右岸经济”的基本内涵得以厘清：城市的初始区位即区位基点一般在河流（人工运河除外）右岸，城市一般首先形成于河流右岸，河流右岸区位一般好于左岸；城市后天区位是基于初始区位成长起来的，后天区位具有资源禀赋的积累性特征，后天区位空间一般大于或至少等于初始区位空间；城市经济扩张的逻辑是先发展右岸经济、做大右岸城市，再延伸扩张至左岸，接着“一江（河）两岸”并举，环线圈层扩张。

有江河穿过或者临近江河的城市，其经济发展脉络基本符合这一规律。从国外看，比如东京位于江户川右岸、莫斯科位于伏尔加河右岸、伦敦位于泰晤士河右岸；国内的长江、湘江、赣江流域，大部分城市或城区的初始区位位于江河右岸，包括上海、南京、长沙等，多会优先选择在江河右岸（右侧）发展。

大江大河“右岸经济”现象，顺应自然规律和城市经济规律，值得重视。这部著作系统性的“右岸经济”理论研究，从实践中来，最终“回到实践中去”，即为作者建议发展“湘江右岸长株经济区”提供支撑，打开了一扇探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窗户”。

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城市主体区域处于湘江左右两岸，构成的长株潭城市群创造全省40%的经济总量，是湖南经济发展最优区域。其中，浏阳市、长沙县、开福区、芙蓉区、天心区、雨花区和株洲市主城区共处湘江右岸，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厚实，是长株潭东翼（长株）融城发展的主战场。《右岸区位与右岸经济》找准理论的具象落点——通过阐述“湘江右岸长株经济区”的建设背景、建设基础与优势、战略定位、发展布局以及更加细分的长株产业示范带的协同共生，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具有实践价值的策略参考。

立足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部著作还提出发展“湘江右岸长株经济区”的路径建议：准确把握好三个定位，即湖南“一带一部”区域发展定位、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战略定位、“三高四新”战略定位；统筹谋划好产业空间布局，发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三个国际级产业集群，配置人力资本、科学技术和大数据“新三要素”，发展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学，以及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数字产业，为“右岸经济”提供关键驱动力。

诚如马克思所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只有来源于实践、作用于实践，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右岸经济”理论在实践检验中，亦会不断完善。当前随着长株潭一体化提速，单纯“右岸”的土地、环境、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已难以承载长期“大干快上”。在“右岸”基点上的跨区位、高质量融合发展势所必然。对此，这部书中也有论及。

经济学著作通常给人深奥、晦涩的“面孔”。阅读《右岸区位与右岸经济》，带给笔者的是通透、敞亮之感。它既有“史”的厚重，也有介入现实的力度和温度。它溯源地理、打捞历史、解读经济而提出“右岸经济”，是为在孕育湖湘文明的“母亲河”湘江之畔，在我们深爱的湖湘大地上，探寻一把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经济钥匙”，畅想经济成效更大、创新能力更强、改革开放更深、生活品质更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的“打开方式”。

（《右岸区位与右岸经济》吴金明、文树勋、沈裕谋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香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读有所得

融合传播的脱贫攻坚主题出版物

——关于《十村记：精准扶贫路》

湘教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2021年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入选项目发布，37个项目入选。湖南教育出版社选送的《精准扶贫路：赵家洼与赤溪》是我省唯一的入选项目。

《精准扶贫路：赵家洼与赤溪》是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十村记：精准扶贫路》丛书《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赤溪清水流》分卷的有声版，系湘教社与山西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及中广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联合开发。两部有声读物制作后，在山西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北京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学习强国等平台播出，受到听众好评。

《十村记：精准扶贫路》丛书，采用独特视角，运用报告文学形式，以十个习近平总书记走访过的村庄脱贫之路讲述这场波澜壮阔的战贫斗争。丛书内容厚重，装帧精美，设计古朴，记录了脱贫攻坚历史、讲好了中国扶贫故事、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中国村级样本，具有较强的社会意义、历史价值及文学价值。

丛书共十册：《十八洞启航》（湖南十八洞村）、《神山梦圆》（江西神山村）、《多彩照金》（陕西照金村）、《春满骆驼湾》（河北骆驼湾村）、《赤溪清水流》（福建赤溪村）、《大湾赞歌》（安徽大湾村）、《张庄之问》（河南张庄村）、《花茂沃土》（贵州花茂村）、《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山西赵家洼村）、《三河水暖》（四川三河村）。

编写团队聚集了众多知名专家。主编刘伟，系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副主编纪红建，湖南省文联主席团成员，其作品《乡村国是》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奖。

目前，这部作品入选了6个国家重点项目（工程）、2个省重点项目。丛书版权输出至俄罗斯、加拿大、韩国等9个国家。俄文版2021年出版发行后在俄罗斯引起较大反响。该书首席翻译专家阿纳托利·耶夫格尼耶维奇·卢基扬诺夫教授系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中友协副主席。为了向俄罗斯读者讲好中国脱贫攻坚故事，卢基扬诺夫教授组织俄知名汉学家组成编译组，精心编译《十村记》俄文版——《托起全面小康中国梦：精准扶贫在华夏》，殚精竭虑审译书稿，确保其高质量出版。本书出版后，卢基扬诺夫教授不幸因病去世，这也是这位知名俄罗斯汉学家的最后一部作品。

丛书实现了主题出版物融合传播，可读、可听、可视。不仅有声读物广泛传播，同名电视专题片在湖南卫视播出，收视率名列全国第三，获评国家广电总局2020年第四季度优秀广播电视新闻作品。专题片内容以短视频形式附于书中，扫描二维码即可观看。

丛书出版发行后获得了各界认可，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及学习强国平台对丛书的出版发行予以报道、评论，发稿共计28条。丛书入选《光明日报》2020年10月光明书榜，《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年年度好书，百道好书榜2020年主题出版类100种好书。

国务院扶贫办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黄承伟认为，《十村记：精准扶贫路》丛书选材独特并具有现实意义。书稿以普通扶贫干部、当地村民为主要书写对象，深入挖掘了精准扶贫脱贫过程中的痛点、难点，体现了十个村落之困，扶贫工作之难，也反映了脱贫成果之显著，对于传播我国精准扶贫脱贫的经验有一定价值。

而《十村记：精准扶贫路》丛书，成功地将主题出版物进行融合传播的经验，也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十村记：精准扶贫路》刘伟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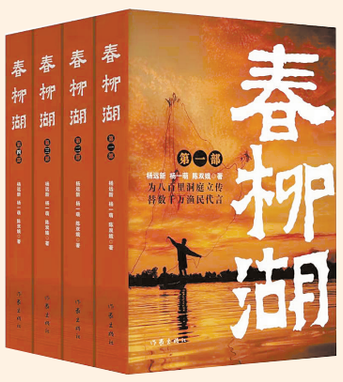
走马观书

《春柳湖》

杨远新 杨一萌 陈双娥 著 作家出版社

240万字的《春柳湖》（全四部），讲述了西洞庭湖畔一个小小渔村百年来发生的沧桑巨变。书中还用一定的篇幅，追述了党的优秀女儿帅孟奇与我党工运领袖许之桢这对革命夫妻，为了崇高目标而牺牲家庭的感人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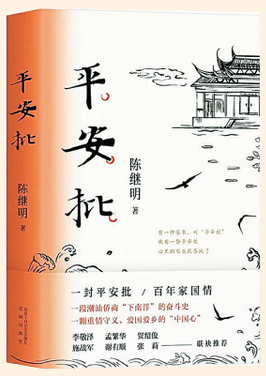
作品塑造了诸多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语言上充分保留了地域色彩，读来倍感亲切。表现手法上，融传统章回体小说的体式与现代小说细描精刻的技法于一体，为读者讲述了一个既现实又浪漫的中国故事。



《平安批》

陈继明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平安批，是早期潮汕、闽南华侨与家乡亲友报平安的往来书信。这部长篇小说以平安批这种具有独特历史意蕴与文化品格的信件为切入点，讲述了一段潮汕侨民“下南洋”的艰难创业史，把拼搏奋斗与文化传承融入百年世事变迁，写出了侨民浓烈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写出了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传统美德。



好书摘读

诗教传统的浸润

郑欣淼

诗教的实质是什么？是教人读诗、爱诗、懂诗。诗教说到底是一种美育，是要培养诗性的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很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所以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他没有说让他去写诗，而是要教人读诗、爱诗，从诗中接受滋养。

《诗经》在春秋时期广泛流传，主要是它的实用价值。孔子为什么说“不学《诗》，无以言”？因为当时常见“献诗陈志”“赋诗言志”，《诗经》在外交和日常交际中发挥着表情达意的工具作用。钱穆先生曾盛赞春秋贵族文化之雅艳，外交之赋诗、引诗为其大宗。当时贵族子弟学习“诗”，就是为了在政治活动和社交场合中陈志、言志。

先秦的用诗形成了中国文化“以诗为证”、引经据典、动辄“子曰诗云”的思维模式，影响深远。这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就是重视融采前贤诗句，喜欢用事用典。而引用经典古诗词表达个人的心志、进行各种交往，更是至今不衰。特别是外交场合，我们不少领导人都喜欢引用古诗词。中华诗词多名篇警句，不仅是精神上难得的滋养，也是外交的宝贵资源；恰当地引用古诗词，既反映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也体现政治智慧与言说技巧，作用是很大的。

诗教之所以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还是由诗词本身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功能所决定的。因为诗词押韵，朗朗上口，又重形象、意境、含蓄，易诵易记，即使一下子不明白它的意思，也比较容易记住，而且记下来是持久性的，小时候记下来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

从孔子始，诗教传统绵延不绝，诗文化蔚为大观。

孔子重视诗教，主要强调通过《诗经》的学习来提升人的内在精神，以达到礼义教化和塑造君子高尚人格的目的。受此观念影响，中国人重视诗歌的审美价值，更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重视精美的诗词作品，更重视诗人的人品。其实历史上有一些人的诗词写得相当好，但是因为他们的人品、节操有亏，就影响到他们诗词的评价与传播。像汪精卫，曾谋杀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他在狱中半年有余，所作诗词共20多首，如“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等等。陈毅元帅《梅岭三章》中的“南国风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的后一句，就是借用汪精卫的诗。但是因为汪最后做了汉奸，成了卖国贼，为国人所不齿，除去研究外，他的诗词就不为人们关注了。

我们多数人都受过毛泽东诗词的教育。毛泽东1957年1月在《诗刊》创刊号公开发表18首旧体诗词，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37首），我都背过。毛泽东的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种版本印了4亿多册。名画家画了不少毛泽东诗意画，毛泽东诗词又被谱成歌曲，各种艺术门类都在传播毛泽东诗词。我曾在一个会上说过，毛泽东诗词所发挥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我们好几代人都深受毛泽东诗词影响，毛泽东诗词的名句、境界、意趣，已成为我们重要的精神力量和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中华诗词的当代价值。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北师大考察，明确提出：“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随后他又强调，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我们现在一说话就蹦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小时候记下的。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

对中国人来说，“诗”不仅是一种语言艺术，更是营造诗意人生与趣味生活、培养高尚人格与高雅情致的资源和途径。

（摘选自《文脉传承》中央文史研究馆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